

晚清名臣骆秉章曾因“高考移民”被取消成绩

这段时间,高考移民是关注热点。其实在古代,这类事情也屡见不鲜,只是当时叫“冒籍”。晚清名臣骆秉章就曾因为冒籍一事被取消过考试成绩。

骆秉章(1793年-1867年),广东花县(现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)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,历任湖南巡抚和四川总督,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,和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人并称为“晚清八大名臣”。

史料记载,骆秉章在早年求学生涯中,有过“冒籍”的经历。冒籍,就是假冒籍贯,参加户籍所在地以外地区的考试,和现在的“高考移民”如出一辙。按清制,凡科举考试,各省参加考试的数额以及录取名额均有限定,录取的规定也按不同区域有所差别。但有一点和现在一样,学子参加考试,必须回原籍报考。由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录取率差异较大,就出现了过继、投亲、买地、冒名、串通官员等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。

嘉庆三年(1798年),6岁的骆秉章得了天花,有幸治愈后破蒙开笔,分别在南海师从拔贡谭守让,庠生方西昆、罗次蕴,举人谢敬轩、谢毓兰和宿儒梁平健等名师。由于师资强悍,加上本人勤学,骆秉章很快成为当地的学霸。

嘉庆十四年(1809年),17岁的骆秉章在南海县试中取得第一名。古代科举分县试、府试、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六种,最后还要加一场“朝考”。县试是考取秀才的第一



关。由于县试成绩太过亮眼,很快被人揭发“冒籍”,经查证后,骆秉章被取消了考试成绩。

据目前的资料,暂没有查到骆秉章冒籍的真正原因,但可以想见,这种冒籍考试应该多与其老师或家庭有关,与本人关系不大。但不管如何,冒籍一事,骆秉章并没有为之气馁,而是又先后师从庠生张唐衢、举人梁植初、进士苏韞石等人努力读书。道光二年(1822年),他第一次赴京会试,但无功而返。道光九年(1829年),他再次赴京会试,依然名落孙山。道光十二年(1832年),他第三次上京会试,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得中壬辰科第六十名进士,殿试二甲第二十七名,朝考入选,钦点翰林院庶吉士。此时,他已年届不惑,可谓大器晚成。

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雍正奖错治“懒政”

雍正元年(1723),苏浙皖地区闹蝗灾,粮食严重不足。

雍正皇帝和大臣们商量,想把山东、河南两省的小米和小麦运往江南贩卖。时任河南巡抚田文镜说:“江南人一向不喜欢小米,如果贩运小米,不但白费力气,折损银两,还不能改变江南缺粮的现状,不如直接运小麦过去。”户部尚书张廷玉对此坚决反对,要求朝廷向江南多贩运一些小米,还质问田文镜:“那么好吃的小米,你久居北方咋知道南方人不喜欢吃呢?”

田文镜和张廷玉各执一词,大臣们一看谁也惹不起,不敢选边站队,索性装聋作哑。雍正帝觉得田文镜和张廷玉的话似乎都有道理,将两个人的意见各采用一半,从山东贩运些小米,从河南贩运些小麦。结果,在南方小麦大卖,小米却

无人问津,无奈之下只好降价处理,朝廷收入折损过半。

为此,雍正帝对田文镜喜爱有加,加官进爵,赏田万亩。就在大臣们认为张廷玉将要大祸临头时,雍正帝却出人意料地宣布:“奖张廷玉黄金百两,黄马褂一件。”

大臣们感到不解,纷纷说:“张廷玉使国家财政受损,犯下这么大的错误,不严惩也要,有啥还要奖励他?”雍正帝严厉地说:“张廷玉的建议虽使朝廷蒙损,但他毕竟是赤胆忠心,处处为朝廷着想,敢于不计名利地为国家献计献策,今天奖励的是他积极参政,敢于担当,敢于作为,也警示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,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尸位素餐者。如果再敢懒政,无所作为,或庸政,不思进取,你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!”

(摘自《老年生活报》)

苏轼的“水滴筹”

近来,德云社一位演员因得重病找到网络众筹平台“水滴筹”发起筹款一事,引起社会关注,网络众筹平台在成为社会援助桥梁的同时,如何获得有效监管,也引发热议。那么在古代,是否有类似的众筹呢?

在宋代,政治家、文学家苏轼曾在杭州搞过一次众筹,成功地救治了百姓的疫病,挽救了许多生命。苏轼的做法堪比现在的水滴筹。

苏轼先后两次任杭州知府,尤其是他第二次到杭州任职时,做了两件名垂青史的事情:一是治理了西湖,留下了苏堤的景观;二是治疗瘟疫,救活无数百姓。

元祐四年(1089年),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次任杭州知府。刚一到任,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。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,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。而城里竟然还有药铺囤积居奇,抬高药价,大发瘟疫财。

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,苏轼十分清醒,他知道,杭州为“水陆之会,疫死比他处常多”。经过慎重考虑,他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政府医院,情况或许会较好掌控。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,怎么办?他同属下商量后,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。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2000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,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。可是还有缺口。苏轼回家后,把情况同夫人一说,夫人认为人命关天,百姓的安危是大事,她应大力支持,于是带头卖掉嫁陪的首饰参加募捐;苏轼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五十两黄金交了上去。

在他们夫妇的带动下,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。

经过众筹,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。于是,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,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,办起了一所名叫“安乐坊”的病坊。据说,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“公立医院”。医院建起后,苏轼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社区救治病人,同时免费发放食品、药品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:“作饘粥,药饵,遣吏扶医,分方治病,活者甚众。”

安乐坊在苏轼的经营下,聘用僧人做掌管,获得了长足发展。苏轼离任后,安乐坊依然办得很红火。到了宋徽宗崇宁二年(1103年),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载:崇宁二年五月,两浙转运司上奏:“苏轼知杭州日,城中有病坊一所,名安乐,以僧主之,三年医愈千人,与紫衣。乞自今管干病坊僧,三年满所医之数,赐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。从之,乃改为安济坊。”就是说,当时的两浙官府对苏轼的做法很是赞赏,上奏宋徽宗对安济坊的医生给予赐紫衣的嘉奖,紫衣当时代表官服,认可了医生的官员身份,并改名为安济坊。

后来,苏轼被贬惠州时,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,说广州疫症流行,死人无数,请教苏轼解决的办法。苏轼毫无保留地把在杭州办药坊治病救人的经验介绍给他,于是广州也照他的办法,众筹办起了安乐坊,救活了不少百姓。

苏轼众筹办医的做法,对宋朝以后的国家政策影响很大,南宋初年则照此法在各地创办了养济院,同样属于官办的医疗救助机构,在宋朝社会救助和医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箴言

△别让别人随便影响你的情绪,也不要太受外界的影响。真正的好心态是,不管什么时候,我们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,做自己认定的事。

△没有稳定的工作,只有稳定的能力。

△能照顾好自己的人,都是能认真履行好习惯的人。

△科学研究表明,通向幸福和成功的6个关键是:1.活在当下;2.提高抗挫折能力;3.让自己处在平静的状态;4.给自己闲暇的时间;5.善待自己;6.关怀他人。

△人最快乐的境界是忘我的境界。

△所有的得失会使我们茁壮,青春从来也是苦乐参半,你变得比从前好,比从前有智慧,就不是浪费。

△人之所以伤心,是因为看得不够远。

△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,最后都要回归平凡,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其价值。

△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乐趣,就不是浪费时间。

△获得幸福的秘密,便是与时间坦然相处。

△当我们面对一个害怕的人、一桩恐惧的事、一份使人不安的心境时,唯一克服这种感觉的态度,便是面对它。

70岁王耕田:脚踩大地的感觉很踏实



▲王耕田回忆着当年的经历 沈三 摄



1949年10月1日,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!”

也是这一天,在株洲县马家河乡南塘村厘水组栗塘队(今天元区马家河街道南塘社区)的一户普通农家里,王耕田出生了。他虽然与共和国同年同月同日生,但却没有取名“国庆”,而是更加朴实的“耕田”。“那个时代,有口饭吃,有田种,是父母对我最朴素的愿望。”王耕田说,“也是我一生的写照,当了一辈子农民,耕了一辈子的田。”

如今,王耕田虽然没有耕田了,和老伴住在慧谷阳光小区里,带孙、散步,日子过得舒坦,但还是怀念村里的日子,“自由、踏实、满足”。

全家一年800多块收入,还是缺粮食

王耕田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,他排行老四,“兄弟姐妹的年龄差别不是很大”。所以,在人民公社时期,他家的劳动力最多,加上父母一共9个人,能挣到很多工分。

王耕田当时虽然只有十几岁,但干起活来很麻利,“修草皮、放牛羊……一天下来能挣2—3个工分。”

王耕田家里人多,挣的工分也多。每到过年时,公社会将每家每户的工分折算成钱发下来,王耕田一家一年可以拿到800多块钱,“这可是一笔巨款,十里八乡的人都羡慕我家。”

虽然有这一笔巨款贴补家用,但也经不住这么多张嘴吃,更何况王耕田和兄弟姐妹们都在长身体。

1962年,王耕田的父亲在马家河铁矿厂上班。因为劳动强度大,矿厂供应给工人的粮食比较充足。每天,他的父亲都从自己吃的米里匀点出来,然后将米藏起来,等到礼拜六,装满满一大袋子米带回家。“白天可不敢生火煮饭,是要被抓的,父母只有等到左右邻居都睡了,黑灯瞎火地悄悄煮饭给我们吃。”王耕田说,“最终还是被举报了。”

后来,每到礼拜六,王耕田的父亲就将匀出来的米煮成米饭带回家。那一天,他一家人就放肆吃个饱。

78岁老农第一次演电影就拿了大奖

据大河报报道 一部小成本国产电影《过昭关》日前在影院上线。影片讲述一位农村爷爷带着来乡下过暑假的孙子,跨越千里去看望老友的故事。

让人意外的是,主角杨太义是第一次演电影。不久前,他凭借这部电影,获得了平遥国际影展“最佳男演员”奖项。导演的老家和杨太义家相距不远,都在河南周口市太康县,回乡选角时,一见到杨太义,导演便觉得他跟电

影角色十分相像。拍摄中,杨太义全程本色出演,导演没让他为角色做任何功课,只是杨太义没骑过三轮摩托,专门花了两天时间学习。担任过多个电影节主席、意大利籍著名电影人马可·穆勒这样评价杨太义:“比专业的(演员)演得都好。”颁奖当天,杨太义上台这样介绍:“我是一个农民,今年78岁,我没演过电影,这是第一次。”话毕,台下掌声雷动,杨太义感觉脸上在放光。

分田到户,拼命干,住上了两层楼房

七十年代末,王耕田经历了几个大事。

1976年,王耕田结婚;1978年,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农民首先实行分田包产到户,王耕田的家分到了田;1979年王耕田的父母给孩子们分了家。

一套碗筷,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土坯房,还有3亩田,王耕田带着这些分得的家产和妻子开始了新的生活。“分田到户后,种粮积极性高涨,粮食都吃不完。”王耕田说。

耕田最忙的季节就是搞“双抢”的时候,“很忙,但只要盘算好时间,其实也不那么辛苦。”王耕田有自己的诀窍。

早上4点,天才蒙蒙亮,王耕田就和妻子下田割稻穗,干到8点多回去吃口饭,“这样做,一天干活的时间就多了4个小时。”打谷机打稻穗,插秧,两口子一个礼拜就可以干完“双抢”。

农闲的时候,王耕田就四处揽活干,“我什么都干,只要能挣钱”。

烧红砖卖、做木匠、做泥工、装卸砂石……都是体力活,但王耕田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“吃亏就吃在没怎么读书,小学都没毕业,大字不认识几个,光有一身蛮力。”王耕田说。

靠着这身蛮力,1989年,王耕田和妻子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房,“那时候的农村,很多人都盖了小楼房。”

虽然盖房子欠了8000多块钱,但在两年后,王耕田两口子就把账还清了,“在那个年代,靠着蛮力也有饭吃,有事做,有钱挣。”

住在城里,带孙、散步,其乐融融

2009年发生了一次意外,王耕田的脚踝骨被掉下来的混凝土压碎,至此他就很少干农活了,“也算是从田里退休了。”

2016年,因为株洲城市的建设,王耕田的家被拆了。他的儿子在慧谷阳光小区买了一套大房子,接来老两口一起住。他的女儿也住在同一个小区,“住得近,走动很方便。”王耕田说。

但也有不适应,王耕田说:“住在城里有城里的好,但我总是怀念以前村里的生活。”

小区里住着四五户同村人,王耕田走动得特别勤,南塘村人固有的语调,让他听起来很舒服。今天你家买回来土鸡蛋,大家分点,明天他家从乡下拿回来的杀猪肉,大家一起聚聚。王耕田割舍不下那一口乡音和一抹乡情。

“也没啥爱好,亲戚朋友来了,我就打打麻将,平时,带带孙子,早上出门散步。”王耕田喜欢坐在阳台的摇椅上,嘴里抽着一口老烟杆,摇一摇椅子,时间就这样慢慢流淌。

勤劳一辈子,耕作一辈子,他说:“踏踏实实过一辈子!”(刘白 黄柳英)



▲资料图